

青年流浪歌手与城市空间再生产*

陆兵哲 刘能

摘要: 空间社会学视角下,街头可视为一种“总体性空间”。基于参与式观察和访谈,对京、沪两地青年流浪歌手的音乐实践空间进行考察发现,借由街头驻唱这一文化实践,青年流浪歌手赋予城市街头多重空间意义。在空间社会化过程中,青年流浪歌手将街头纳入自己的日常生活世界,并基于对不同空间机制的感知、选择与能动实践,实现对城市街头空间的不断重塑、刻画和再生产。青年流浪歌手与街头空间的关系勾勒出社会行动者与其所嵌入的空间之间的互构过程,是城市空间再生产的本质。

关键词: 城市空间 青年流浪歌手 街头空间 空间社会学 空间再生产

一、引言

中国大城市的商业区、广场、公园等街头公共空间经常可以见到青年流浪歌手的身影。他们会占据一个特定空间,用乐器、扩音设备和其他标志性物品(如包装简易的样品光碟、供观众投币的特定容器等)搭建一个模拟舞台,与行经或驻足的路人形成一种流动的“表演—观看”关系(Horlor, 2019a)。随着移动直播平台的发展,这种基于“表演—观看”关系的沟通实效从相对有限的实质空间(substantive space)进入相对扩散的虚拟空间(virtual space),使街头演唱的工具性动机凸显(Horlor 2019b)。换句话说,街头歌唱不仅是个体自我技能和人性的具身化及其自然展演,也隐含个体试图在特定网络生态(即知名度和关注度竞争的内容市场)中建构自身地位的努力。

如何从社会学的视角理解街头流浪歌手这一现象?一方面,这些非正式的个体表演者通常被视为城市越轨者,与相关管理部门(如城管、工商、卫生等)的城市秩序想象相背离,成为地方社会治理主体关注、回应和处置的对象(McNamara & Quilter 2016);另一方面,作为一种特殊的亚文化,街头流浪歌手的驻唱实践,成为界定城市开放性和包容性的一个重要注脚(Marina 2018)。除社会控制和城市自发性视角之外,流浪歌手现象还有其他理解视角。例如,也可以从一个成长中的新兴青年阶层的结构视角来认识该群体,其文化新阶层属性是对“文化资本”内涵的重塑,表现为技能多元化、个人化、流动化的“新专业主义”和“新人脉主义”;作为文化个体,街头流浪歌手似乎在街头展演了一种无需赋权的文化权威形象(廉思、周媛 2019)。此外,街头流浪歌手虽然也是音乐从业者,但大多未接受系统的音乐训练,不具备完整的专业音乐素养,仅凭个人爱好到街头演唱,通过对城市公共空间的有意识占用(intentional appropriation)揭示出音乐表演的社会分层(Marina 2018),即不同专业等级地位的从业者占有不同的表演场所。

社会学对街头流浪歌手群体存在多元分析视角,我们基于梳理文献和实地调研发现,这一群体最值得关注的是他们的“空间”属性。换句话说,街头流浪歌手需要选择空间、占据空间、定义空间边界、维持流动的“表演—观看”的空间关系,最终成为其所嵌入的更大空间——城市的文化属性的一个定义性特征。社会科学视角下的“空间”不仅是人们行动的外在容器、真空背景和静默舞台,

*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硕士研究生刘建、扎西顿珠、张文军参与了本研究的调研工作,调研活动也得到《南风窗》“调研中国·青年领导力公益计划”的资助,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其本身也是社会的一部分,是社会的“表达”(expression)(Castells 2010: 440)。所谓“空间”,不仅是处所(place)、位置(position)、地点(site)等固定的自然概念,也是被赋予社会意义的“社会空间”(景天魁等 2012: 8)。空间性(spatiality)本身就是一种社会产物,是社会生活的物质构成和结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Soja, 1985: 90)。

空间社会学通常关注三个方面:首先,空间与社会因素的关系,即阶级、教育、权力、性别等社会因素如何通过空间向度发挥作用;其次,空间与行为因素的关系,强调二者的相互影响和作用;最后,空间与文化、心理因素的关系,特定社会文化被视为空间意义的基础和渊源(Gottdiener et al., 2011: 19-21)。从空间社会学的视角考察城市街头流浪歌手,不仅可以通过理解空间机制来探寻青年歌手群体的总体特征,还能够在歌手与街头空间的互动中发现该群体在城市语境下的自我认同塑造和展演等能动实践。将街头青年流浪歌手视为城市空间的参与者,不仅能揭示该群体在城市中的社会境遇,也能够为人与城市空间的关系提供一种反思。

二、文献回顾、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

(一) 已有研究及其局限

对城市街头流浪歌手及街头音乐活动,学界通常将之纳入街头艺人和街头表演范畴加以考察。意大利、英国和法国的相关研究主要讨论声音与印刷媒介之间相互烘托和促进的关系。城市歌手的空间表达成为吸引政治视线或表达异端理念的政治现象,也成为社会争夺和社会控制的具象(Salzberg & Rospoche 2012; DeglInnocenti & Rospoche 2016; McShane 2019; McIlvenna 2019)。关于古代流浪艺人的研究发现,作为江湖艺人的游民促进了通俗文艺在宋代以及明清的发展,各种通俗文艺作品(戏曲、说话、曲艺等)可被视为游民意识的载体,也揭示出游民文化的结构性位置,即在大传统之下以声音媒介传递、维持口头文化,传播小传统的意识形态。总体来说,国内外已有研究主要从个体经历、文化实践、艺术表达、街头表演或街头艺人作为社会控制与社会管理对象这四方面展开。

首先,街头表演作为一种个体经历。许多研究将街头演出视为城市个体的自我选择,悬置对其所处宏观社会结构的分析,聚焦于个体在街头生活情境中的体验和遭遇。尽管街头艺人经常被视作城市中的边缘人,但街头表演在一些城市是被社会排斥的中下阶层创造性地谋求生计的一种文化解决方案,他们也由此获得一定的社会地位(Marina 2018)。这不仅得益于都市社会的流动性和包容性(胡玉福 2014),也得益于街头表演者的日常社会交往。例如,观众自发的物质奖赏作为一种礼物而非商业交易,使街头艺人获得较高的道德地位认同(Horlor 2019b)。同时,街头艺人群体内部也通过伙伴关系或学习共同体等方式展开广泛合作,在陌生都市中实现相互支持(Tan & Bunnell 2020)。

其次,街头表演作为一种文化实践。这一研究取向认为街头音乐或表演最大的意义在于文化实践,承担了特定的社会文化功能。在欧洲,街头歌手在文艺复兴时期以来的社会史中扮演培育市民文化的重要角色(Salzberg & Rospoche 2012; DeglInnocenti & Rospoche 2016; McShane 2019; McIlvenna, 2019);美国的当代街头音乐活动也曾通过继承、影响古典音乐文化而发挥文化遗产的作用(洛秦, 2001: 234-235)。在现代大城市中,街头歌手的表演对文化传播和文化多元化均产生了积极影响(杨明辉 2006)。街头音乐已成为当代城市声景(soundscape)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Bennett & Rogers, 2014)。流浪歌手的这些文化实践也被视为特定社会文化的反映(林媛 2005),他们通过为城市日常生活注入社会性和欢愉性(sociality and conviviality)而塑造城市文化的独特性(Simpson 2011)。

再次,街头表演作为一种艺术表达。街头音乐表演被视为一种最原始的音乐传播形态,使音乐在其最初形态就成为人际情感沟通的重要方式(曾遂今 2002),音乐价值观念本身也影响人们对街头音乐表演的评价(Williams 2016)。城市音乐人类学的相关研究展示了流浪歌手对音乐风格的选择与呈现方式,揭示了他们的音乐行为,以及音乐本质和功能的相关思想如何在城市化进程中嬗变(汤亚汀, 2003);街头音乐表演通过为人们带来积极心理影响而实现音乐审美的生活化(李宁、王林飞 2012)。

最后,街头艺人作为城市管理对象。街头艺人往往游离于城市管理制度之外,因此街头表演通常被视为一种城市失范现象,作为一种城市社会问题而引起学者关注(张鹏、蒲卉 2020)。但是,如今许多城市政府开始将街头艺人当作一种文化和商业资产来对待,并建立相关规范和制度鼓励和管理街头表演(McNamara & Quilter 2016)。尤其在旅游业兴盛的城市,政府给街头表演者颁发许可证,把街头表演塑造为地方传统的一部分融入城市品牌宣传,发挥其经济价值(Astor, 2019; Green 2020)。受国外相关实践与研究的启发,中国学者也开始讨论如何将该群体纳入现行管理体制,考虑实施“考核上岗、持证演出”等制度的可行性(吴启佑等 2013)。

上述研究关注的重点是街头艺人及其活动,而忽略了“街头”这一空间背景。街头歌手选择城市广场、街道、地铁站等非舞台性场所,是他们与其他音乐从业者最显著的区别,甚至是这一群体的本质特征,因此,对该群体的研究不能忽视其“街头空间展演”的属性。鉴于此,本文将街头的空间属性纳入对城市流浪歌手的研究,从空间社会学角度考察这一群体在城市中的社会存在、社会境遇和社会实践。

(二) 街头作为“总体性空间”

社会空间相关研究存在两种主要取向和理论脉络。一是空间的政治性。相关研究关注空间对维持现存政治经济秩序的作用,揭示出空间的非中立性,认为空间是一种受政治操控的力量,尤其关注交织于空间中的生产关系和权力关系。亨利·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认为,空间的本质就是生产关系;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通过空间再生产实现了社会关系的再生产,从而延续了资本在社会中的主导地位及其强势的逻辑结构(Lefebvre, 1974: 41-42)。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把监狱、医院等场所视为空间封闭、隔离和等级化的手段,这些空间操纵的实质意图和效果是渗透、维持一种权力关系(Foucault, 1975: 200-229)。二是空间的总体性。空间的总体性被视为资本或权力对空间切割与碎片化处理的对立面,呈现的是空间的使用者,即作为“空间的内容”的人(Lefebvre, 2000: 50-51),立足于人的能动性与空间的情境性(刘能 2014)的结合,揭示普通人如何在情境化的日常空间中能动地改造和利用空间。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认为,巴西利亚等城市的现代主义规划是失败的,在权威的城市空间规划之外,人们能够基于实践知识自发创造出更具生命力的“多样化空间”(Scott, 1998: 116-146)。德·塞托(Michel de Certeau)通过描述普通人的日常实践,发现人们能够运用日常生活的“战术”重新分配空间,并赋予空间新的意义,从而改写、覆盖特定空间的权力符号(de Certeau, 1990: 147-154)。综合来说,“空间的政治性”和“空间的总体性”基本上勾勒出当代空间社会学研究的主要取向。

空间社会学大多是城市研究的产物,城市以最大的密度集中展示了社会关系与空间结构之间的复杂联系(叶涯剑 2005),大量城市空间研究沿着“空间的总体性”脉络展开。正如列斐伏尔所言,城市权利就是一种有待实现的总体性,“意味着建立或重建一种时间和空间的统一性,一种取代了分割的联合体”(Lefebvre, 2000: 21-23)。延续这一思路,本文将街道、广场等城市空间视为一种总体性空间,从中可以看到普通人的空间能动性大致体现在定义和认知空间的能力、维持空间状态的能力、在空间维度中表达和维持情感的能力、进行空间动员的能力四方面。在“总体性空间”的理论视野下,城市空间成为普通城市参与者彰显自身主体地位的场域,其中充斥着各种旨在赋予空间意义、维持自我认同和重构社会关系的能动实践。作为城市基础设施的街道,是“城市中的主要公共区域,是一个城市最重要的器官”(Jacobs, 1961: 29),“在整个人类定居生活的历史进程中,街道和广场都是城市的中心和聚会的场所”(Gehl, 2011: 89)。基于此,本文将流浪歌手活动的“街头”解读为一种特殊的城市空间,并从“空间的总体性”这一理论脉络展开具体分析。这不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把握这一群体的主要特征,也能将这些城市参与者带入研究的中心视野,考察他们如何能动地认知、体验并改造其所处的空间情境。

(三) 研究方法

本文是一项空间民族志研究成果。民族志方法具有开放性和持续进行性,适用于展示和研究

空间的混乱性、偶然性和流动性(Scholl et al. 2014) 。在空间民族志的方法论中,空间和地点与其创造者一样具有能动性,会影响人们的行动和实践(Sen & Silverman 2014: 9) 。通过对人造物(建筑、街道、家具和其它形式的物质文化) 的分析,了解人们如何使用这些人造物、如何赋予其意义,从而获得书面材料、物质文化、口头证据等手段难以触及的文化内容(Sen 2014: 97 - 98) 。空间民族志是人文地理学、建筑学与民族志方法的结合,前者依赖地图、摄影等空间可视化再现方式,后者则通过访谈、观察等方法收集数据。

研究团队于2019年8月在北京、上海两地对城市街头音乐现象和街头流浪歌手开展田野调查,采用空间观察与半结构化访谈,共调研了26个街头青年流浪歌手的聚集点,包括北京的五棵松华熙 Live 广场、什刹海公园、国家奥体中心、知春路地铁站等,以及上海的静安公园、吴江路步行街、人民广场、虹桥艺术中心等。研究者主要通过两种方式收集资料:一是用空间编码的方式记录街头歌手所处空间的指标化特征,通过在不同点位与时段的观察,研究团队共获得33份空间编码表;二是绘制空间观察记录图,即观察街头流浪歌手的同时现场绘图记录周围的建筑、人流、植被、市政设施等空间要素及其分布,最终获得28张空间记录图。与此同时,研究团队采用方便抽样和滚雪球抽样的方式选取了13名访谈对象,每人每次的访谈时长1—3小时不等,主题包括成为街头流浪歌手的动力和阻碍、在不同城市街头的遭遇、对街头演唱的认识、与观众的互动经历、个人生活史和社会网络等。受访者基本信息见表1。

表1 被访者基本信息

被访者	性别	出生年份	民族	籍贯	学历	音乐专业背景	调研时演唱地点
阿莲	女	1996	汉族	天津	高中	无	北京国家奥体中心
阿阳	男	1992	汉族	山西	硕士研究生	有	北京国家奥体中心
阿松	男	1989	汉族	山东	初中	无	北京景山公园
阿青	男	1995	汉族	新疆	大学本科	无	北京什刹海公园
阿元	男	1986	汉族	辽宁	大学本科	有	北京五棵松商业中心
阿玉	男	1985	汉族	云南	高中	无	北京五棵松商业中心
阿蕾	女	1997	汉族	北京	大学专科	无	北京五棵松商业中心
阿秦	男	1994	汉族	黑龙江	初中	无	北京知春路地铁站
阿昌	男	1990	汉族	广东	初中	无	北京知春路地铁站
阿木	男	1993	彝族	四川	职业高中	无	上海静安公园
阿松	男	1994	彝族	四川	初中	无	上海静安公园
阿敏	男	1980	汉族	湖南	职业高中	无	上海吴江路步行街
阿伟	男	1986	汉族	安徽	大学专科	无	上海久光百货步行街

三、街头的空间特性

(一) 功能开放性与规则真空

街头空间具有功能上的开放性(非指定性),被歌手用作演唱场所时,可以不受音乐或表演形式的规定性约束,由此带来的自由灵活、无所拘束的自主性、任意性是城市街头吸引歌手的首要特征。在上海街头演唱的阿伟,街头演出之余也参加一些商业演出,比较这两种表演方式,他更加青睐街头空间的功能开放性。

街头的要求跟商演或演唱会不一样,后两个都要按流程、按要求走,不容许出错。街头相对自由一些,经常表演可以沉淀一些东西。街头做得好不好就看自己对自己有没有要求。(阿

伟 20190808)

空间功能上的真空通常导致行动规则的真空。尽管城市街头空间并非绝对的功能真空,但具体音乐表现形式上的非指定性使歌手在街头的音乐行为更能够随心所欲。正如歌手阿伟所言,不同于正式商业演出,街头演唱无须遵循固定的节目单和演出程序,歌手可以自己决定曲目和表演方式。

(二) 行为自发性与符号互动

街头是容纳自发性行动(即非约定性行动)的特定空间,意味着歌手与观众在街头的相遇充满自主选择的色彩,路人主动的驻足聆听也被赋予更多意义。对街头歌手来说,“路人驻足成为观众”的符号互动色彩浓厚,被理解为观众主动释放其对歌手的肯定与认可。这种积极信号在歌手与观众之间传递,也是街头音乐区别于正式舞台音乐的独有特点,其“主动认可”的意涵带给街头歌手很大的成就感。歌手阿木在街头演唱之前,曾在酒吧驻唱一年,但他并未从中体会到足够的意义感,反而在走上街头后找到了自我价值感。

在酒吧表演,你只是个背景音乐,喝酒的人很少会专门听,所以没太大存在感。但是在街头表演就很有成就感,那么多观众围着你一个人表演,那种被认可、被尊重的感觉让我心里很温暖,也很自豪。(阿木 20190811)

阿木在提到这种“被尊重的感觉”时神情颇为兴奋,观众的主动认可信号的确赋予街头青年歌手充分的自我价值感。越是在城市街头这种缺乏明确约定性、可预期性较弱的空间中,人与人之间互动的符号意义越容易被捕捉,这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为何街头空间能带给流浪歌手自我价值感。

(三) 平等性与共同在场

街头作为临时舞台,没有正式舞台上表演者与观众之间的空间障碍设置,使其几乎对所有参与者都是平等开放的;街头演唱也具有了“共同在场”的性质:歌手与观众之间的距离感被弱化,观众更容易进入街头歌手塑造的音乐氛围中,由欣赏者变为参与者,这对歌手而言很重要。在北京五棵松商业广场演唱的阿元,曾获得某大型歌唱选秀节目的季军,是音乐造诣较高的被访者,他对音乐活动的理想期待是观众的深入参与。

街头没有一个搭建起来的台阶,是一个开放的、观众可以随时参与进来的地方。观众跟着一起唱,不会像 Live House 里一样被当成噪音。观众可以跟着我们嗨,歌手和观众一起律动,才能真正让人感受到音乐的力量,形成一种“灵魂场”的互动。(阿元 20190820)

访谈中,阿元多次表达这样一个理念:音乐不同于绘画等静态艺术形式,它是一种动态的、进行中的艺术形式,有其释放的“时空场”。作为舞台的城市街头具备的“共同在场”性契合了音乐的这一特性,街头演唱也更容易把音乐的力量传递给观众,达到观众与歌手的共鸣。

(四) 流动性与情境空间性

城市街头具有很强的流动性,即使在同一地点,每天的人群也不同。“街头”可被理解为一种以身体为核心的“在场的时空关联”,被纳入一种“情境空间性”(spatiality of situation),而非“位置空间性”(spatiality of position)(Giddens, 1984: 65)。这种情境空间性赋予街头空间多种可能性,给人们带来新鲜感、即时感和情绪促发感。在调研中,当被问及为何青睐街头演唱时,许多街头歌手讲述了他们在街头演唱时不期而遇的感动经历,如冬天演出时观众送来的一杯热奶茶、情人节演出时收到的玫瑰花等。被访者都表达了对这些经历的珍视,认为这些感动和惊喜也是他们选择街头并

坚持下来的动力之一。同一地点在不同时间的不同情境也意味着不同的社会空间,街头流动性和空间情境性使街头歌手的演唱生活变得丰富多样,也激发了歌手对街头演出的可持续期待。

四、空间社会化

空间不仅影响人的社会体验,还被赋予不同的情感价值观(Durkheim, 1990: 15 - 16)。换句话说,空间不是均质的,不同的空间安排可能被赋予不同的社会意义,这对街头流浪歌手来说非常重要。作为城市的普通参与者,赋予空间不同意义的过程也是其实现空间定义的过程,是普通人的能动实践在城市空间安排中的一种表达,突显出“空间总体性”理论脉络的重要维度:常人行动者在充满能动性的空间实践中编织着自己的生活世界。流浪歌手赋予街头空间的意义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 生计空间

许多流浪歌手将城市街头视为谋生地点,他们会在音响设备前放置钱箱和收款二维码;而开放的、没有准入门槛的街头空间也为专业水平不足以入驻酒吧或承接商业演出的歌手提供了一个权宜性的谋生场所。甚至在一些城市中,街头演出已成一些歌手的主要收入来源,使之能够维持在大城市的高成本生活。例如,在实行街头艺人“持证上岗”政策的上海,流浪歌手阿伟在街头唱歌平均每天收入400元至500元,一周演出五天,每月街头演唱收入在8000元到10000元之间。尽管多位访谈对象不愿透露自己的具体收入,但都表示“既然我能够在上海生存下去,就证明这个工作(街头演唱)能够带给我生存的基本保障”(阿敏, 20190811)。街头空间对流浪歌手的生计意义显而易见。

(二) 宣传空间

在城市街头演唱的歌手除非专业的音乐爱好者之外,也有大量职业音乐人。他们具备独立制作音乐的专业能力,也作为职业歌手参加商业演出。对这些人来说,高流动性和曝光度的街头更像一种宣传空间,他们在街头演唱的过程中向路人发放名片,向人们宣传自己。职业歌手期待获得更多的商业资源,而开放且多元的城市街头无疑提供了这种可能性;他们在街头演唱时,经常遇到有演出需求的人上前攀谈。例如,来自云南的街头歌手阿玉在五棵松商业广场露天演唱时,便有人上前询问是否愿意几天后到三里屯为一场商业活动演唱;歌手阿昌在北京知春路地铁站演唱时,道路对面的餐厅老板出来与之攀谈,想聘请他到餐厅驻唱,但最终因价格未谈妥而失败。

(三) 体验空间

除经济考量外,一些流浪歌手还将街头演唱当作一种生活体验,把城市街头视为一种体验空间,这种空间意义赋予尤其体现在年轻歌手身上。街头空间以一种完全开放的方式暴露于城市情境中,一些年轻歌手将街头视为生活体验空间,在其中感受日常生活的丰富多样。来自新疆的街头歌手阿青是北京某高校的学生,他从大二开始便在课余时间到街头演唱,这成为他体会都会生活的一个窗口。

新疆人很少,我们喜欢在空旷的山上开车旅行,喜欢走到哪儿唱到哪儿的感觉,和街头唱歌比较像。而且在大街上看到的人很多,男女老少,形形色色,接触很广泛,这种感觉很好。
(阿青, 20190819)

对阿青这样的青年歌手来说,街头因其随机性和多样性而成为折射城市生活的万花筒,成为感受城市生活的窗口。阿青甚至告诉我们,“真正走上街头做音乐的,都是将街头音乐当作一种体验”。

(四) 交往空间

空间不仅体现社会关系,还反作用于社会关系(Soja, 1989: 81)。基于社会关系的建立,城市街

头成为歌手的交往空间,主要体现在两方面:首先,街头演唱成为歌手之间相互交往的过程,很多街头音乐组合都是在街头演唱时偶然结识,歌手在街头演唱过程中也会形成相互欣赏的“圈子”相互交流技术,提高音乐水平;其次,城市街头也是歌手与民众展开交往的空间,街头歌手与城市民众之间并非单纯的“演唱者—听众”的主客关系,而是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的互动关系,正如阿青所言:

外边(街头)能看到男女老少,大家都有共鸣,感觉比酒吧的人更多元,比如有小孩、老人。尤其北京的大爷大妈很热情,唱了一会儿他们就会来聊天,跟他们聊天让我很“长知识”。(阿青 20190819)

作为城市外来者的街头歌手在与观众“聊天”的过程中将自己嵌入城市的社会网络,在社会交往实践中建立起对城市的认同。主体之间的社会互动“填充了”原本空洞、无价值的空间(Simmel, 2009: 545),街头因此成为充满社会性的交往空间,成为社会关系被激活的场域。

(五) 发展空间

大城市的街头被青年流浪歌手视为充满发展机会的地方。一方面,职业音乐人可以利用街头特有的空间特征提升自己的音乐水平。例如,在北京国家奥体中心街头的歌手阿阳其实是北京某唱片公司的职业歌手。他之所以到街头演唱,是因为“街头唱歌跟琴房练歌不一样,有观众互动,唱歌会更认真”。另一方面,普通街头歌手出于某种“音乐梦想”来到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寻求学习提升机会。例如,云南歌手阿玉之所以到北京街头演唱,是因为与他共同来京的哥哥认为他虽然有强烈的音乐梦想但不善交流,于是带他“到五棵松(商业中心)做街头演出,不是为了挣钱,更多是想出来锻炼一下”。这些歌手把城市街头视为提升歌唱水平的场所,或视为接近音乐梦想的第一步台阶。对他们来说,城市街头是充满自我提升和锻炼机会的发展空间。

对流浪歌手来说,城市街头具有多样的空间意义。他们的多样化空间定义与认知使城市街头呈现为一种“总体性空间”,人们在其中将某一地点或区域建构为适合某些特定社会活动和行为的“地方类型”,使之具备特定的场所辨识度,成为“用作这个的地方”或“用作那个的地方”(Shields, 2013: 30-33)。这一(社会)空间化过程不仅承载着“总体性空间”中人的能动性表达,也对“空间的生产”具有重要意义。正是通过(社会)空间化,物理空间才被“社会地”生产为一种社会现实,成为嵌入社会生活的重要变量。

五、街头歌手的空间实践与城市空间再生产

将城市街头视为一种总体性空间,不仅要看到街头空间特征对行动者的吸引,以及行动者对街头空间的定义和意义赋予,还要认识到行动者空间实践的生成性。具体来说,流浪歌手对街头的自主选择与空间实践也重塑、刻画着城市街头,并实现总体性空间的再生产。

在人们的空间感知和实践方面,物理空间要素起着关键作用。凯文·林奇(Kevin Lynch)在他的“城市意象”理论中强调城市居民对建成空间的经验感知,以及这一感知在市民日常生活世界中的重要地位(Lynch, 1960: 1-13)。在《水晶之城》(City of Quartz)一书中,迈克·戴维斯(Mike Davis)从建筑符号学的角度分析建筑的不同风格,以及街道、广场等设施的空间布局,揭示了不同空间要素在日常生活中的社会意义。受此启发,本文尝试探究流浪歌手如何在具体实践过程中感知、内化城市街头空间隐含的各种机制,以及他们选择、重塑和再生产街头空间的过程。

首先,采用空间编码的方式呈现街头歌手对演唱空间的自然选择过程。研究团队从交通可达度、交通亲和度、空间开放程度、空间监管程度、空间稳定性、空间防御性和空间主权性等多个维度测量了流浪歌手选择和占据的街头位点的空间属性,采用5级量表记录观察结果(1分最低,5分最

高,参见表2)。交通可达度和交通亲和力测量的是街头歌手选择空间位点与既有交通基础设施的相对关系,高分值地点意味着与多样化交通基础设施的“接近性”,低分值地点意味着与交通基础设施的“低连接性”或“连接障碍”;空间开放程度测量的是歌手所选空间位点与任何一位行经并驻足的潜在观众在入场、互动和沟通方面表现出来的(无)障碍程度;空间监管程度指涉城市社会管理机构及其代理人在场干预的可能性;空间稳定性涉及现场表演受内外因素干扰的可能性,包括天气变化(例如雨、雪、阳光直射)、上下班高峰期的交通流量及其带来的噪音等;空间防御性指该空间带给街头歌手的安全感差异(歌手背后有可依靠的空间往往成为首选);空间主权性指其他合法主体对歌手所选空间位点的管理权和所有权,以及这两种权属对空间利用的授权程度。另外两个次要的维度是空间提供的维生功能和空间的人流接触密度。这九个空间维度综合起来构建了街头歌手空间占用行为的基础心理动机和理性化程度。

数据分析结果显示,流浪歌手驻守演唱的街头空间位点通常具有较高的开放程度(4.75分)、相对较低的监管程度(2.94分)和较弱的空间主权性(1.81分),这些构成了流浪歌手青睐的“可占用公共空间”的具体属性。尽管歌手驻唱的街头具有较高的交通可达度(4.06分),但交通亲和力并不高(3.13分),说明街头歌手通常选择交通便利但更适合步行的人行道路。这样的场所通常具备适宜的空间稳定性(3.50分)和足够的空间接触密度(周围人流量平均为23.31人/分钟),有较多的驻足观众(平均为23.14人)。

表2 街头歌手选择地点的空间编码表及观察结果(N=33;第四列括号内为标准差)

编码指标	指标含义	量表范围	平均观察值*
交通可达度	到周围公交站、地铁站、火车站等交通枢纽的方便程度	1 2 3 4 5 周围几无交通— 在交通枢纽旁	4.06 (0.7719)
空间开放程度	封闭(如商场、火车站、店铺)、半封闭(如天桥下)、露天(如街头、广场)	1 2 3 4 5 封闭一半封闭—露天	4.75 (0.7746)
交通亲和力	其所在位置与道路的关系	1 2 3 4 5 远离道路—小路旁—主干道旁	3.13 (0.8062)
空间监管程度	周围民警、保安、巡逻人员等的数量和距离	1 2 3 4 5 附近几无—很多很近	2.94 (1.2366)
空间稳定性	周围车流量和车速、行人速度、噪音程度等	1 2 3 4 5 很不稳定—非常稳定	3.50 (1.0328)
空间防御性	如建筑立面凹槽处、背靠墙/栏杆等减少自我暴露的空间,则有较强防御性	1 2 3 4 5 防御性弱—防御性强	3.88 (1.4083)
空间主权性	所在空间是否有明确或潜在的权利归属	1 2 3 4 5 弱—强 (纯公共空间)(店面门前)	1.81 (0.8342)
地点维生功能	周围是否有水源、卫生间等	1 2 3 4 5 弱—强	4.25 (0.7746)
空间接触密度	周围人流量(测量其面前5米内每分钟经过人数)		23.31人(12.81)
驻足人数	观察时刻驻足听歌人数		23.14人(27.89)

其次,运用绘制空间观察图的方式揭示流浪歌手选择城市街头空间点位时如何将街头的空间要素纳入自己的日常实践。综合观察结果发现,流浪歌手对具体演唱地点的选择具有明显的“边界效应”,他们倾向于选择建筑物立面的凹处、后退的入口、门廊、树旁等地点(如图1)。这些城市建筑物立面的区域和两个空间之间的过渡区域通常是人们的逗留地带(Gehl 2011: 148-150),将之与空间编码表对照发现,这些要素也能够赋予空间较强的防御性(3.88分)。尽管流浪歌手在城市

街头演唱可以获得更高的公众曝光度,但由于自己的身份一定程度上脱离了既有的管理制度,所以他们选择具体驻唱地点时更倾向防御性较强的空间,在融入城市的同时,又可以让自己看起来不太突兀。可以说,街头空间意义的“边界效应”是流浪歌手在空间实践中主动选择的结果。也正是行动者在日常实践中的主动选择,让城市空间不再是均质的物理空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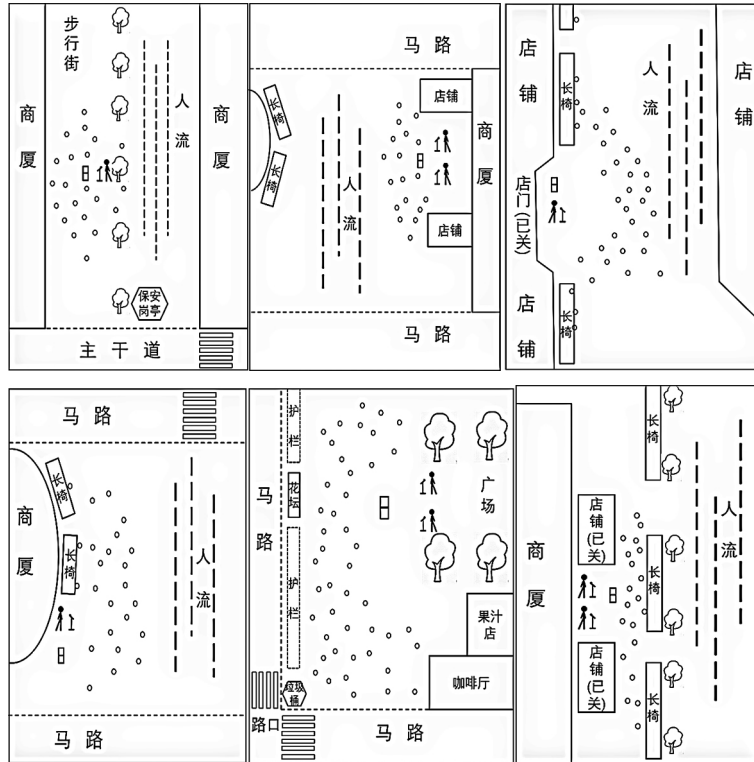


图1 田野观察记录的空间图(图中每个小圈代表一位驻足行人)

城市空间既是人类行为实现的场所和连续的路径,又是人们维持、强化或重构现有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的社会实践区域(潘泽泉 2009)。对城市流浪歌手来说,他们在不断选择、占用街头空间的同时,也实现了特定城市空间的再生产,如街头流浪歌手通过背靠物体、面朝方向、话筒位置、钱箱距离等策略建构的各种街头小空间(如图1)。对一座城市来说,这一空间塑造本身就是街头空间的再生产过程。通过空间的重新布局和配置,街头歌手创造出更具包容性的空间场景,并在观众的参与下激活和“软化”城市空间(Doughty & Lagerqvist 2016)。街头不仅是城市交通设施的附属品,也富有社会性、公共性的“场所”功能。

这种常人空间实践的生成性也是“空间的总体性”视角带给我们的启发之一。它使我们看到,城市不仅是资本积累的载体和资本循环的产物(Harvey, 1985: 1-31),也是充满以普通人日常生活为本质内容的“第三空间”(Soja, 1996: 70)。由此可见“城市空间再生产”的另一层重要意义:“城市空间再生产”不仅表现为政府权力和地产资本主导的“城市开发”,还表现为城市居民对自己日常生活的城市情境性空间的塑造,后者正是“空间的总体性”视角揭示的内容。

六、结论与讨论

对流浪歌手来说,城市不仅是人们居住的建筑环境,也是非正式舞台(盖尔·吉姆松 2003: 68),更是一种时空集合体(李翔宁 2008: 47)。街头作为一种城市空间具有独特的社会意涵,流浪歌手

对街头空间特征的感知反映出他们选择街头的动机偏好,他们赋予空间意义的实践也可以看到该群体对日常生活和自我认同的维持,而他们对街头空间的主动选择和再生产也提供了一种理解该群体与城市互动的路径。

把城市街头视为一种“总体性空间”也让我们看到常人行动者与空间的动态关系。首先,某个地点特有的空间特征能够影响置身其中的行动者,使暴露于空间机制的人在内在化空间特征的过程中形成不同的个人体验和行为偏好,此时人是空间(空间特征)的载体。其次,行动者可以能动地赋予空间社会意义,即“空间化”过程,人们在空间阐释的基础上建构自己的日常生活世界,此时空间是人(社会意义)的载体。最后,行动者可以自主安排和重塑社会空间,在各种空间变量的参与下建构自己的行动,并再生产出完整的空间图景,此时空间与人的互构关系得以直接体现。基于“总体性空间”的意义,空间与人的互动过程很大程度上是“空间生产”在日常生活中的展开过程。如果说在“空间的政治性”视野中,“空间的生产”是资本和政治权力维护现存政治经济秩序的手段,那么在“空间的总体性”视野下,我们从城市街头的流浪歌手身上看到了充满主体性的普通人在空间中的能动力量:行动者与空间的相互建构和相互生产。

参考文献:

- 盖尔·扬·拉尔斯·吉姆松 2003,《公共空间·公共生活》,汤羽扬、王兵、戚军译,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 胡玉福 2014,《都市民俗学对都市个体及其创造性知识的关注——以一位上海市街头歌手为例》,《民间文化论坛》第4期。
- 景天魁、何健、邓万春、顾金士 2012,《时空社会学:理论和方法》,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 李宁、王林飞 2012,《极度关注:生活中的艺术现象——关于街头音乐现象的美学思考》,《大众文艺》第3期。
- 李翔宇 2008,《想象与真实:当代城市理论的多重视角》,北京:中国电力出版社。
- 廉思、周媛 2019,《文化新阶层的群体特征、社会功能与发展趋势研究——基于北京、上海、成都三地的实证调研》,《中国青年研究》第1期。
- 林媛 2005,《评〈街头音乐:美国社会和文化的一个缩影〉》,《音乐研究》第2期。
- 刘能 2014,《重返空间社会学:继承费孝通先生的学术遗产》,《学海》第4期。
- 洛秦 2001,《街头音乐:美国社会和文化的一个缩影》,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
- 潘泽泉 2009,《当代社会学理论的社会空间转向》,《江苏社会科学》第1期。
- 汤亚汀 2003,《西方城市音乐人类学理论概述》,《音乐艺术(上海音乐学院学报)》第2期。
- 吴启佑、陈诗允、许一鸣 2013,《对上海街头艺人管理法规制订的思考》,《科学发展》第10期。
- 杨明辉 2006,《吉庆街街头音乐活动调查报告》,《黄钟(武汉音乐学院学报)》第S1期。
- 叶涯剑 2005,《空间社会学的缘起及发展——社会研究的一种新视角》,《河南社会科学》第5期。
- 曾遂今 2002,《街头音乐与现代城市文明》,《福建艺术》第3期。
- 张鹏、蒲卉 2020,《此心安处是故乡——失范理论视域下城市街头艺人空间行为与治理研究》,《人文地理》第2期。
- Astor, Avi 2019, "Street Performance, Public Space, and the Boundaries of Urban Desirability: The Case of Living Statues in Barcelon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Urb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43(6).
- Bennett, Andy & Ian Rogers 2014, "Street Music, Technology and the Urban Soundscape." *Continuum: Journal of Media & Cultural Studies* 28(4).
- Castells, Manuel 2010, *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Malden: Wiley-Blackwell.
- de Certeau, Michel 1990, *L'Invention du Quotidien. I. Arts de Faire*. Paris: Gallimard.
- Degl'Innocenti, Luca & Massimo Rospocher 2016, "Street Singers: An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Italian Studies* 71(2).
- Durkheim, Émile 1990, *Les Formes Élémentaires de la vie Religieuse: Le Système Totémique en Australie*. Paris: Le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 Foucault, Michel 1975, *Surveiller et Punir: Naissance de la Prison*. Paris: Gallimard.
- Gehl, Jan 2011, *Life between Buildings: Using Public Space*. Washington D. C.: Island Press.
- Giddens, Anthony 1984, *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Outline of the Theory of Structuratio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Gottdiener, Mark, Ray Hutchison & Michael T. Ryan 2011, *The New Urban Sociology* (4th edition). Boulder: Westview Press.
- Green, Andrew 2020, "Street Music, Governance, and Cultural Policy in San Cristóbal de las Casa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Policy* 26(4).
- Harvey, David 1985, *The Urbanization of Capital: Studies in the History and Theory of Capitalist Urbanization*. Oxford: Basil Blackwell.
- Horlor, Samuel 2019a, "Permeable Frames: Intersections of the Performance, the Everyday, and the Ethical in Chinese Street Singing." *Ethnomusicology Forum* 28(1).
- 2019b, "Neutralizing Temporary Inequities in Moral Status: Chinese Street Singers and the Gift Economy." *Asian Music* 50(2).
- Jacobs, Jane 1961, *The Death and Life of Great American Cities*. New York: Vintage Books.
- Lefebvre, Henri 1974, *La Production de l'Espace*. Paris: Anthropos.
- 2000, *Espace et Politique: Le Droit à la Ville II*. Paris: Anthropos-Economica.
- Lynch, Kevin 1960, *The Image of the City*. Cambridge: MIT Press.
- Marina, Peter 2018, "Buskers of New Orleans: Transgressive Sociology in the Urban Underbelly."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thnography* 47(3).
- McIlvenna, Una 2019, "Chanteurs de Rue, or Street Singers in Early Modern France." *Renaissance Studies* 33(1).
- McNamara, Luke & Julia Quilter 2016, "Street Music and the Law in Australia: Busker Perspectives on the Impact of Local Council Rules and Regulations." *The Journal of Musicological Research* 35(2).
- McShane, Angela 2019, "Political Street Songs and Singers in Seventeenth-century England." *Renaissance Studies* 33(1).
- Salzberg, Rosa & Massimo Rospoche 2012, "Street Singers in Italian Renaissance Urban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 *Cultural and Social History* 9(1).
- Scholl, Sebastian, Matthias Lahr-Kurten & Marc Redepenning 2014, "Considering the Role of Presence and Absence in Space Constructions. Ethnography Methodology in Human Geography." *Historical Social Research* 39(2).
- Sen, Arijit 2014, "Eating Ethnicity: Spatial Ethnography of Hyderabad House Restaurant on Devon Avenue, Chicago." In Arijit Sen & Lisa Silverman (eds.), *Making Place: Space and Embodiment in the City*.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Scott, James C. 1998, *Seeing Like a State: How Certain Schemes to Improve the Human Condition Have Faile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Sen, Arijit & Lisa Silverman 2014, "Embodied Placemaking: an Important Category of Critical Analysis." In Arijit Sen & Lisa Silverman (eds.), *Making Place: Space and Embodiment in the City*.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Shields, Rob 2013, *Spatial Questions: Cultural Topologies and Social Spatialisation*. London: Sage Publication.
- Simmel, Georg 2009, *Sociology: Inquiries into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Forms*, A. J. Blasi, A. K. Jacobs & M. J. Kanjirathinkal (trans.), Boston: Brill.
- Simpson, Paul 2011, "Street Performance and the City: Public Space, Sociality, and Intervening in the Everyday." *Space and Culture* 14(4).
- Soja, Edward W. 1985, "The Spatiality of Social Life: Towards a Transformative Retheorisation." In D. Gregory & J. Urry (eds.), *Social Relations and Spatial Structures*. London: Palgrave.
- 1989, *Postmodern Geographies: The Reassertion of Space in Critical Social Theory*. London: Verso.
- 1996, *Thirdspace: Journeys to Los Angeles and Other Real-and-Imagined Places*.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 Tan, Xin W. A. & Tim Bunnell 2020, "Extending Aspirations: Taipei Street Performers and Collaborative Possibility."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45(2).
- Williams, Joseph 2016, "Busking in Musical Thought: Value, Affect, and Becoming." *The Journal of Musicological Research* 35(2).

作者单位: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责任编辑: 林红

Young Wandering Singers and the Reproduction of Urban Space

..... *Lu Bingzhe & Liu Neng(63)*

Abstract: Under the perspective of spatial sociology , we could regard the street as a “totality space”. Based on participatory observation and interview , this paper tries to examine the musical practice space of young wandering singers in Beijing and Shanghai. According to the findings , the wandering singers would endow the urban streets with multiple spatial meanings through the cultural practice of singing on the streets. In the process of spatial socialization , the young wandering singers would include the streets into their daily life world; meanwhile , based on the perception , selection and active practice of different spatial mechanisms , they would realize the continual reshaping , characterization and reproduction of urban street spac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young wandering singers and street space also outlines the process of inter-construction between social actors and their embedded spaces , which is precisely the essence of the reproduction of urban space.

Keywords: Urban Space Young Wandering Singers Street Space Spatial Sociology Spatial Reproduction

Identification and Segmentation: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Adaptation among College Students Returning to School after Retiring from Military Service

..... *Zhang Zaiyun , Luan Zhengwei & Zhang Hefeng(74)*

Abstract: Taking the theory of cultural adaptation as research perspective and starting from three aspects of “class-school-society” , this paper tries to explore the adaptation pattern and formation mechanism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among college students returning to school after retiring from military service at S University in Shanghai city. According to the findings , for the college students returning to school , they would conduct interaction with other people through three roles , namely the strangers in the class , the differentiators in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 on the campus and the advocates of military culture; they would present the adaptation strategy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characterized by “multi-layer elastic adaptation”; on this basis , they would construct the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network with high homogeneity . Regarding this abnormal adaptation pattern of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 the deep logic behind this is cultural segmentation , which is created by their high recognition and practice of military culture; concretely speaking , this adaption pattern would present three mechanisms , namely the uncertainty avoidance , the selective identification and the salience of cultural identity. Regarding the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adaptation among these college students returning to school , whether breaking or maintaining this cultural segmentation is the core element.

Keywords: College Students Returning to School after Retiring from Military Service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 Adaptation Multi-Layer Elastic Adaptation Cultural Segmentation

The Practice of Participation in Child Care of “New Father” and Its Reflection

..... *Gao Xiujuan(85)*

Abstract: Father’s participation in child care is the main method for contemporary society to solve the dilemma of child rearing. It is also the core issue of discourse and practice regarding “new father” , which is very popular in current western society. According to the analysis , the “new father” discourse aims to establish the ideal father image which could combine the work and childrearing , and hence include the childcare into the scope of fatherhood. However , “new father” only acts as the helper of childrearing and player , their participation in child care is not sufficient; meanwhile , their caring behavior is always associated with their occupational characteristic and masculinity , which would strengthen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father’s caring labor and general caring labor. The current work system would make the “new father” face the conflict between work and family , and they couldn’t sufficiently participate in the caring labor of child. In the gender differentiation regarding the field of social production and population reproduction , the males would have some advantages over females , which could also act as hindering role for participation in child care of “new father” and gender equality.

Keywords: New Father Child Care Work Family Balance Gender Equality